西南交大：老师选优 学生投票

□本报见习记者 陈彬

在理想的条件下，纯粹的启发式教育最能唤起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兴趣，然而在西南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蒋葛夫看来，“启发式教育需要一个过程”。于是，通过一些活动，一方面引起教师对课堂教学方法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让学生更多地关注课堂，便成为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从这个角度上说，学生在网上公开评选优秀教师，更像是一个师生交流的平台。

董怡辰 / 制图

提起大学的政治课，你能想到什么？枯燥？照本宣科？逃课？不得不承认，在很多高校，政治课在学生的印象中就是这样。但也有例外，比如西南交通大学讲授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刘占祥老师，便凭借其风趣的谈吐、不落俗套的授课，让政治课变得妙趣横生。

做刘老师的学生无疑是幸福的。那么，如何才能表达他们的这种“幸福”呢？学生们自有办法——在该校举办的首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老师评选中，投上刘老师一票。

学生积极：新鲜感不是唯一动力

学生在网上公开评选优秀教师，这在西南交大可是第一次。打开专门的评选网页，52位通过连续三年学生评价及学院推荐方式产生的候选老师的“简历”赫然在列，每一位参与投票的学生最多可以投10票。投票程序相当正规。

西南交大本科学生郭力荣便是刘占祥课堂上“幸福学生”中的一员。很自然的，刘老师1729张选票中，也有他的一份。其实，郭力荣现在已经读大四了。在很多学校里，大四学生的“主业”是考研和找工作，对类似的校园评选早已充耳不闻，那么面对此次评选，像郭力荣这样“有闲心”的师兄、学姐还多吗？

“当然多了。”郭力荣回答，“至少我周围的同学几乎全都参加了。”

据西南交大教务处10月17日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的数字，此次评选活动共吸引10645名学生参与投票，共有有效票34247票。

杨雪今年同样读大四，在听说学校将组织这次评选之初，她便养成了一天登陆一次校园网的习惯，为的就是早点能投票，在投票开始的第一天，她便和宿舍里所有的舍友集体行使了一次“选举人”的权利。而据她所知，她身边的同学也几乎都参与了投票。

至于为什么如此积极，杨雪没有否认其中有“第一次参加，觉得新鲜”的因素，但她强调，原因绝不仅限于此。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表达一下我们对这些优秀老师的赞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校四年，和这些老师最了解，我们的投票也能对低年级的同学在选课上有一些帮助。”杨雪说。

老师感言：爱学生才是获奖真因

有评选便有获胜者，经过半个多月的投票，西南交大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刘霓以1989票摘得头名。

刘霓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得第一。“我觉得我还挺年轻，有那么多经验丰富的好老师在我前面，没想到我能得到这么多选票，有点受宠若惊。”其实刘霓有些谦虚了，因为她在学生中的“名气”并不小。杨雪和郭力荣尽管都没有上过她的课，却对她早有耳闻。“早就听说过她，是个好老师！”

既然名列第一，就有必要介绍一下“经验”，然而面对记者的这一要求，刘霓却似乎显得有些为难：“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吧，如果有的话，可能是我对学生更加在乎吧。”

据刘霓介绍，每次上课之前，她都会认真考虑如何才能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在课程的安排和课堂教学上，她也会尽其所能让学生学得更加轻松，对学生学习中的每一件小事，她也会全身心地帮助解决。“我希望我的学生能从我这里学得更多，学得更好。”

在这次评选中，该校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冯晓云名列第九。对于这一成绩，冯晓云同样大呼意外，不过她感到意外的原因却与刘霓截然不同。

“如果是离校四五年的毕业生评选，我对自己很有信心。但是能被现在的学生选中，我没想到。”

冯晓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在教学中一直以“严”字当先，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我不允许学生有任何的松懈，尤其是那些能力强的学生，只要他们没用尽全力，成绩再好我也不答应。”而她认为这份苦心只有学生步入社会后，才能真正体会。但目前看来，她似乎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冯老师是严，但那是对我们的爱。”郭力荣这样说。

无论是刘霓还是冯晓云，或者是其他的入选老师，也许他们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那便是——对学生的爱。

学校反思：让学生再次关注课堂

事实上，除了西南交大，近几年举行“学生票选最受欢迎教师”活动的高校在国内并不少见。例如在今年5月，四川大学便举办过类似活动，当老师的讲台换成选举台时，对高校教学而言意味着什么？

对此，西南交大分管本科教学的常务副校长蒋葛夫对记者表示，学校举办此类活动，很重要的意义便在于，希望以此将学生再次引入课堂。

“随着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目前高校中学生的学习渠道日渐增多。课堂教学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是学生的唯一选择。”蒋葛夫说，然而课堂教学在日常教学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学校必须将学生的关注点再次引回到课堂。

在理想的条件下，纯粹的启发式教育最能唤起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兴趣，然而在蒋葛夫看来，这种状态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启发式教育需要一个过程”。于是，通过一些活动，一方面引起教师对课堂教学方法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让学生更多地关注课堂，便成为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上说，该活动更像是一个师生交流的平台。而据郭力荣说，的确有一些同学仅仅是为了验证某位老师是否如票选结果那样好，便专门去听他讲课，回来后大呼过瘾，相信这样的学生会成为教师课堂中的“常客”。

“一次活动不可能将所有学生请回课堂，相关的改变还会有很多，但至少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蒋葛夫说。

大讲堂

目前基于常识的观点认为，学生对旧学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能够创造新学科的基础。以上认识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创造新学科所要突破的恰好是旧学科的范式。因此，在旧的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得越精确、取得成功越多的人，陷入旧的范式陷阱越深，越难跳出陷阱而作出创造。

卢晓东：“范式陷阱”与大学制度改革

□本报记者 孙琛辉

在金庸小说《鹿鼎记》中，冷兵器时代趋于结束，热兵器时代的手枪出现了。一名十几岁的孩子，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训练，就能用手枪威胁一位花四十二年修炼出“一指禅”的禅师。这个情况显然和俗语“天道酬勤”大相径庭。

在近日举办的北京大学教育论坛上，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兼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作了《试答钱学森之问——创新人才培养的三项改革》的报告，他基于科学哲学中“范式”的概念，就《鹿鼎记》的例子提出“范式陷阱”。他认为，在旧的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得越精确、取得成功越多的人，陷入旧的范式陷阱越深，越难跳出陷阱而作出创造。

“范式”一词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关键概念，该书首次发表于1962年。卢晓东介绍，构成一种范式的是某一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们所采纳的一般性理论假定和定律，以及应用这些假定和定律的技术。范式包含三个重要部分，第一部分是明确陈述的基本定律和理论假定，第二部分是将基本定律应用到各种不同类型境况中去的标准方法，第三部分是一些非常一般的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规定。一门成熟的科学是由一种单一的范式所支配的。

库恩在创造范式这个概念后，指出了科学进步的途径：第一步，由前科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范式逐步明晰，科学家在范式内从事解决难题的活动；第二步，由于根本性的问题不能够得以解决，爆发科学危机；第三步，产生科学革命，旧的范式被打破，新的范式得以创立。然后，科学发展会进入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新的科学革命。

“相对于尚未诞生的新学科而言，所谓旧学科就是我们当下的常规科学，其中的范式就是我们目前教科书所传达的知识核心。目前基于常识的观点认为，学生对旧学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能够创造新学科的基础。”卢晓东说，“以上认识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创造新学科所要突破的恰好是旧学科的范式。”

所要突破的东西如何能够成为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呢？卢晓东提出质疑：“如果学生对旧的范式非常熟悉并精确掌握，他是否会对旧的范式产生某种信赖(而非怀疑)、甚至信仰因而不愿意、或者说更加难以突破旧的范式呢？”

卢晓东提到，当今在信息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多个具有革命性的创新领导者都是大学未毕业者（退学者），包括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甲骨文公司总裁拉林·埃里森，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戴尔首席执行官贝尔，以及拍出《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这两部全球票房前二位、同时正在引导电影史中3D革命的导演卡梅隆等。在卢晓东看来，没有通过现代大学持续深入的学习而陷入旧范式之中，是他们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或前提。

由此，卢晓东提出四个猜想。第一个猜想是：大学生学习量太多使学生陷入范式陷阱而难有创造力的发展。他列举了北京几所高校的学分要求，北京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专业毕业的教学计划折算学分接近217学分；北京联合大学的毕业学分要求是200学分左右……

美国的大学在可比情况下(学时学分对应数可比)，本科毕业学分要求一般是128学分左右，日本2000～2010年间已经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本科毕业学分要求一般在124学分左右。“横向比较，我们的学生确实学得太多，这也许使得他们陷入范式陷阱越深而难以有创造力的原因。”

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纵向比较来看，西南联大本科毕业应修的学分数是132学分左右。

“学校设置的课程越来越多、越学越难，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反而变弱了。怪圈的原因何在？正是范式陷阱在作怪。”卢晓东对此提出以下改革建议：以减为加。建议教育部出台统一的法规，将本科毕业的学分要求降低到120～140学分之间；在此之前，各个大学可以先行开始减少本科毕业应修学分要求。

第二个猜想是：目前我国考试以趋同性思维为主，特别是高考。趋同性思维的试题，会使学生陷入范式陷阱。而发散性思维的试题，会促使学生怀疑态度的养成和想象力的培养。

卢晓东提到，与趋同性思维紧密相连的考试制度包括教育部正在推行的某些研究生一级学科统考。当各高校自行出题时，题目保持了相当的多样性，离范式陷阱远一些；而教育部统一出题时，全国的学科教育便开始构架一个深深的范式陷阱。这一政策与部分高校为提高考研率对学科考试的反复训练联系在一起，显然不是在培养创造性人才，而是在培养一些短期得意的范式陷入者。

第三个猜想是：百分制的给分方式趋向于使学生追求更加精确的知识，学生对既有知识和范式过度精确的追求容易陷入范式陷阱。卢晓东推崇用宽泛的“等级”评分制度取代精确的总分。

1886年，哈佛引入字母等级的评分方式，进而以4分制为基础进行绩点排序。卢晓东认为，这可以淡化学生对过分细化成绩的追求，如学生不会为追求99和91分之间的细微差别而过分努力。因为这两个成绩的绩点相同。

第四个猜想是：学生奖励体系，特别是奖学金体系如三好生评选、奖学金评审等，都在奖励学习得非常精确、在现有范式中沉浸过深的学生。

卢晓东说，中国大学奖学金制度成绩占60%以上，而剑桥大学奖学金制度与成绩无关。剑桥的奖学金设立原则、评价标准、评选程序和经费用途，都鼓励学生开展原创性、前瞻性、基础性研究，学生可依据专业和兴趣主动申请并提交研究计划。

“如果将我国大学的奖学金从奖励学习成绩，转变为奖励创新，才能有助于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好地培养出创新人才。”卢晓东总结道，创新需要一定的基础，但过多的、被加强的基础，那些学生全面继承的旧的知识体系，反而会制约创造力的发展。

中国大学评论

大学政策急需删繁就简

□尤小立

大学的“去行政化”在经历了口号化阶段后，下一步就应该是付诸实施了。复旦大学相对独立的学术委员会的成立，或可看做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一个成果，但对大多数院校来说，这个哪怕是初步的行动，也好像是步履维艰。

从现有体制上看，“去行政化”必须是由上而下的，但由于政策的不明确，习惯于按政策办事的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处于观望状态。当然，说是“观望”也未必准确，有些院校也在动，这种“动”，打的也是“去行政化”的招牌，却与“去行政化”无关，甚至有的政策还在加剧“行政化”。高等院校的“岿然不动”有着各种情况，有些是不知怎么动，动了怕有风险，不如静止；有些是想利用政策不明确的机会，剑走偏锋，从而获得某种小集体的利益。

虽然“去行政化”实施起来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但是没有可遵守的原则，这个“去行政化”就很难实施。即便实施起来，也多是在走形式，结果反而会引起更多的失望。像前两年大学内部改革中的“大部制”就是如此。从“系”到“院”的升格运动本来就够折腾了，再来个凌驾“系”、“院”之上的“部”。学校的部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随之而来的是头衔的增加。而在中国，大部分有头衔者都是能上不能下的，这种增加大学行政负担的举动，怎么可以称为“去行政化”呢？

“去行政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删繁就简，这也是任何的一项行政改革政策需要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最近，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教授在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上指出：“现在的奖励名目过多，但质量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术浮躁。”韩启德的这一席话表达得很含蓄，却是痛心疾首的肺腑之言。因为奖励太多，助长的不仅是学术上的浮躁，而且会造成学术界的进一步腐败，以及学者整体上的异化。

其实，要删繁就简的不仅是繁多而无益的奖励。检讨一下现今大学的各种政策，有多少是直接促进科研和教学的？又有多少是落到实处或者可以落实的？大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模仿国外一流大学的做法本身无可厚非。现今政策的制定者或政策执行者要么有国外留学的经验，要么多次出国考察访问，又有多年的教育管理和大学管理经验，但选择模仿国外一流大学的政策时，不仅非常形式化，而且似乎忘记了国外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反省的问题。

删繁就简不仅是减少行政性政策的数量，也包括保持现有政策的稳定。如果一个政策没有多久就要修改，这说明政策本身就缺乏科学性。比如大学内部的职称评定，它的标准制定就不仅要相对稳定，而且要简化。因为唯有稳定，才能体现公平，也才有权威性；唯有政策简化才可能做到公开透明，唯有简化的程序才便于执行和操作。职称评定最重要的原则是看申报人的科研成果，这早已是常识。因为学位高低、课题经费多寡、获奖与否、是否有留学经历，最后都体现在成果是否过硬之上。

现在有些大学，不时修改政策，不断添加若干条莫名其妙的强制性要求，这种缺乏常识的“与时俱进”被解读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奇怪了。以奖项和课题项目来冲抵成果以及不分专业的片面要求留学经历，只能将大学教师或学者拉向学术以外的领域。如果哪一天大学教师或学者都在学术研究以外的方面拼搏，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磨炼成八面玲珑的无敌勇士，但这种“无敌勇士”肯定与纯粹的学者或学问无关，离大学教师的职业道德，也会越来越远。

大学政策上的删繁就简，还包括对于政策可行性的准确预判，以及有效把握政策与大学教育理念的关系。今年有些大学实行的研究生按一级学科大类设置教学课程就是一个例子。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情况看，大学的专业性教育已经一推再推，从大三、大四推到了硕士生，再从硕士生推到了博士生。这当然可以看做是向通识教育回归。可大学的通识教育只是本科教育的要求，到了研究生阶段应该是专业化教育。按照新的研究生教学改革的办法，专门化、精细化的课程大大减少，研究生学习的只有“概论”或“通论”以及集体讲授的点到为止的“前沿讲座”。这些大而化之的皮毛知识，永远无法将研究生带向具体且真实的学术领域，研究生自然也永远无法叩开专业之门。这样的政策执行下去只会产生一个行政性的“效益”：为学校节省课时费。

简化政策，当然不是不要政策，而是说大学的政策需要遵守常识，直面诸如“去行政化”之类的问题。只有这样，大学的政策才能变成具体而有效的行动，也才能体现出它的时代价值。